

关于国家治理中舆论治理方面的辩证思考

——以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为例

虞崇胜,何路社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在国家治理的舆论治理方面,西方国家依据权力客观理性化的现实主义思路,形成了一种市场性社会舆论客观管控方式。其在容错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国家治理;舆论治理;公信力;新冠疫情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20)99-0071-06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1]而且,不仅中国,整个全球也是同样的面对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大考。

西方国家疫情应对技术性失误,主要是早期麻痹大意,严重轻视忽视了疫情的危害性,反应迟钝、应对不力,犹豫不决耽误了阻断病毒传播的最佳时机;疫情爆发后则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他们的政治决策可用“愚蠢颞颥”四个字来形容,没有迅速把握好国家治理从正常状态向紧急状态的转变,和国家治理中生命与自由的价值排序、生命至上还是经济至上及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辩证关系的本末倒置。国家治理中,非正常的紧急状态总是短期暂时的,如洪灾、疫情、战争、动乱……而正常状态则是长期恒久的。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治理需要强调集中与纪律,把握好其中的转变过程。

本文拟就其中的舆论治理方面进行一些深入思考讨论。舆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掌握舆论上的话语权至关重要。而且,在全球化时代的当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掌握国内舆论话语权的同时,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

1 从疫情看社会舆论治理思路

观念决定思路,舆论治理也是如此。舆论自由

与舆论管制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因而与之相对应也有侧重不同的两种不同观念的社会舆论治理思路。一种是将国家权力客观理性化,允许容忍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因而只须承担有限的国家治理责任。一种是将国家权力主观道德化,不允许容忍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因而必须承担无限的国家治理责任。但国家权力非神,国家治理实践证明任何国家权力都无法承担无限的国家治理责任。结果,国家权力要么为了避免国家治理失效通向极权一意孤行,要么国家权力丧失权威国家治理低效四面楚歌。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西方国家属于这一种社会舆论治理思路,即将国家权力客观理性化,原则上能够允许容忍社会舆论对国家治理政策措施及当权者批评议论。历史上信息开放先进的传统工商社会环境,是其存在产生的基础或土壤。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观念中有一来自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言,并得到公认的无赖假设:“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将每一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且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取私利,别无其它目标。”^[2]这次西方国家主流媒体有关本国新冠病毒疫情报道,其角色就主要表现为批评监督政府。特别是美国主流媒体,如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几乎是对特朗普政府每天一黑,每天都在指责政府这也做的不好那也做的不对。不管其出了个什么政策,说了句什么样的话,都能找到黑点和不足之处。《纽约时报》说美国“彻底浪费了2个月的时间”,《华盛顿邮报》说美国“错过了最关键的70天”。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

收稿日期:2020-06-09

作者简介:虞崇胜,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何路社,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公共权力等方面的研究。E-mail:a8627859@126.com

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出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的“观点”文章,认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波士顿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日报,同时也是美国被公认的“最具声望的报章”的《波士顿环球报》,于2020年3月30日,以编辑委员会名义发表一篇社论,言辞犀利,不仅在标题里指出“一位不胜任的总统”,而且在副标题里更直接斥责到“许多苦难和死亡本可避免,总统手上沾满鲜血”。美国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也撰文严厉批评了美国应对疫情的策略,称美国是“死亡和否认”之国。他批评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领导人的昏庸: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正在死去时,总统还在炫耀他的收视率。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这些主流媒体,却也无可奈何。

再让我们来看看1964年发生的那个经典的美国“纽约时报案”。当时,在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领导下,以黑人为代表的有色人种频繁游行示威,抗议社会歧视和种族主义政策。马丁·路德·金为此曾被拘留四次,但是《纽约时报》却报道成七次,还有其他一些不尽准确的细节。结果,当地官员起诉报社“诽谤”,要求赔偿名誉损失。州法院认定报社有错,责令赔偿50万美元。但是上诉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一判决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对言论和新闻的保护。理由很简单,因为新闻报道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瑕疵;如果在法庭上不能自证自己的言论属实,动辄就要受到重金处罚甚至丧失人身自由,那么今后谁还敢说政府一个“不”字?这种规则对公众监督政府官员显然是不利的。因此,最高法院改变了针对官员言论的法律规则。如果是官员控告有人诽谤,那么他自己必须证明被告带有“实际恶意”,也就是说被告是在明知故犯、恶意侮辱。不难看出,这种证明是难上加难,以致一般认为在这个里程碑式的判决之后,美国大小官员都丧失了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即便公众批评错误也只得忍气吞声。正如该案中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所指出:“全国人民坚信这样一条原则: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生动活泼地和完全开放地讨论公共事务,可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进行猛烈的、辛

辣的,有时还是令人不悦的尖锐抨击。”^[3]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完全不对社会舆论进行控制,绝对的言论自由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社会舆论控制基本上是在由法治规定限制的范围内。而且,非正常时期(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等情况)比正常时期更加严厉。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对战地新闻报道提出很多限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要求媒体记者和新闻报道必须维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念,他们必须配合政府从正面报道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媒体的自由采访、自由报道常常会受到政府或其他政治力量的限制、干涉和阻挠。如这次疫情中法国前卫生部长布赞在《世界报》报料,她早在一月份就向总统和总理示警,并公开反对举行第一轮市长选举。据法国专家们分析,如果推迟这次选举的话,将会对执政党极其不利。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坚持投票的原因。可谁也想不到,第二天就一切烟消云散!仿佛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后来布赞女士的爆料终于有了新进展。但其不是来自媒体,更不是来自政府,而是几位医生。他们把总理和前卫生部长以不作为的罪名告到法院。但上网去搜一下,法国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过这件事情。

另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利用所掌握的经济权力对社会舆论进行各种干涉,以控制与影响社会舆论的立场和取向。比如,2020年3月19日,美国《西雅图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讲述一位就职于华盛顿州一家医院且拥有18年急诊科工作经验名叫Ming Lin的华裔医生,指控在美国的新冠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他所在的“和平健康圣约瑟夫医疗中心”却应对上准备不足,甚至没有给医护人员提供足够的防护,将员工置于高风险之下,并持续发帖批评医院的工作不足,还拒绝了医院方面删帖的要求。然而,之后他却被他的雇主开除了。

但是,相对而言西方新闻媒体及其记者还是有较自由的批评监督权,他们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政府官员的表现进行种种批评议论。如美国著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一生和政府唱反调,美国政府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还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因此,西方国家社会舆论相当程度上的独立自由,实际中起到

了极大的制约权力作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管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安东尼·赛奇教授即指出,西方国家一般说来,市民对本国领导人评价都偏低,原因在于他们国内民众对本国领导人的批评很多。以奥巴马为例,天天电视台、报纸上有针对他的不同看法,经常有批评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不好,当然另有一部分人觉得他好。英国、德国和法国也是一样,这些国家对本国领导人也有很多不同观点和看法,所以满意度低。^[4]美国新闻界的诺贝尔奖——每年一度的普利策奖,其绝大部分都是报道美国政府的负面新闻。不过,这方面也有严格的一定限度,即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不得不屈服于政府、政党与资本,以及市场约束和控制新闻舆论。

2 从疫情看社会舆论治理

在不同的社会舆论治理思路下,必然形成不同的社会舆论管控方式。西方国家遵循权力客观理性化的现实主义思路,形成一种市场性社会舆论客观管控方式。

在社会舆论领域,西方媒体早已经形成了市场性的多元化现象。即社交媒体,官方媒体,民间媒体,和不同利益方,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媒体都有;不同媒体之间观点相左的有之,支持反对党的媒体有之,支持执政党的媒体有之。从而让民众有一种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并通过自由比较就能够容易得到相对客观公正的认知。隐藏在媒体多元化与舆论自由的水面之下的是,看不见的西方国家市场性社会舆论客观管控方式。

下面便是以上所述的一个生动形象例证:这次新冠疫情中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吐槽特朗普中午才进办公室,惹得特朗普连发三条推文表明自己是“史上最勤奋总统”,斥责《纽约时报》是“假新闻”：“了解我和我们国家历史的人都说我是史上最努力工作的总统。我不知道这点,但我是个努力工作的人,在我前3年半的任期里完成的工作可能比史上任何一名总统都多。假新闻讨厌它!”几分钟后,意犹未尽的特朗普又写道：“我从清晨工作到深夜,好几个月都没离开过白宫(除了出席‘安慰号’医院船启航礼),处理贸易协议、军队重建等事务,然后我在失败的《纽约时报》读到了一个关于我工作安排和饮食习惯的假故事,这个故事由一个

对我一无所知的三流记者撰写。”特朗普的愤怒来自于《纽约时报》2020年4月23日的一篇报道,报道援引多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描绘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特朗普的工作情况。就在特朗普怒斥《纽约时报》之际,一些白宫官员也急忙替总统辩护,称总统在疫情期间会忙到错过午餐。“作为一个新上任的白宫幕僚长,我最关心的问题是确保他有时间快速吃点东西。”上月底才上任的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26日对《纽约邮报》说。他透露特朗普最近有一次凌晨3点19分给他打了电话。他那时正在睡觉,没有料到总统会那么晚来电话。梅多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会回到椭圆办公室,就在办公室外吃个午饭,还经常会被几通电话打断……我来这5星期了,就没见过他每天哪怕能抽出10分钟时间。”另一名白宫官员则称,特朗普有时还不吃午饭,“有时候甚至都不去想午饭了,很多时候要么是没时间吃,要么只有10分钟吃。”还有官员干脆拿出了特朗普的通话数据,称他光是上周三早上就打了24通电话,6:30分就已经在和美国财长姆努钦通话了,当天晚上和国会议员及州长的电话又打到11:30分。

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分权,而权力分散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分散责任,国家只承担有限的责任。有限责任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选举制度下,政党之间分权竞争,不称职的政党下台就行,制度不承担责任。又比如联邦政府有横向的三权分立,任何一个分支都没有完整的权力,也不承担责任。再比如美国联邦权和州权有纵向的分权,涉及人民生活的很多方面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所以联邦政府就可以甩锅。分权制度具有分解、消化、瓦解政治批评的能力,而与社会舆论治理有关系之处,是在行政过程中政府应对出现失误时,国民是否把它归结为不当控制社会舆论的原因。西方国家的社会舆论相对自由下,他们的社会就表现得容错能力较高,同时也能通过有效的批评监督,及时发现错误或缺陷,让国家治理政策措施适应具体形势的千变万化。如从法国卫生部1月21日第一次就疫情对全国发表讲话,提出健康人无需戴口罩,历经两个半月的质疑才终于改正过来。可是并没有人解释原因,也没有人道歉,没有人因此承担责任。

由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民众产生了一种个人利益和自由至上的个

人主义文化,疫情中的群体利益往往难以被优先考虑与重视之故而致于如此。所以,这次全球疫情应对中,西方国家政治家的表现并不是不对民众负责,相反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迎合民众的要求才如此。也因为,舆论监督需要通过民众压力的中介,才能促使政府及官员行动。否则,他们也会充耳不闻,出于经常性普遍性的批评监督而早已经习以为常。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错在阶级剥削压迫造成社会不公,这才是其与生俱来无法克服的根本缺陷。西方国家如果没有民主选举与舆论自由,疫情还会更糟糕。

虽然国家拥有立法、行政、司法等三大权力,但公民享有舆论的自由,有权利用舆论来监督约束政府各级权力者的各种职务行为,其具体形式为社会舆论。特别是思想类的非大众化的精英化舆论,即由思想家引领的各种时代思潮,是一种超理性的舆论,更应保障其自由,让其相互竞争,强调其对国家权力的根本关键性制约作用。西方国家学者将舆论定义为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舆论若具有自由独立性,则是无冕之王,可以实现对权力真正有效的舆论监督。制定《记者法》时,其中应有研究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专家学者参与,以吸收借鉴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经验教训。不过,古为今用中要注意立足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特征与规律。类似于检察官与法官,相应也要制定一部《编辑法》,实行采编分流,二者之间相互制衡,避免一枝独大滥用舆论监督权,甚至以权谋私腐败。

舆论导向正确是国家与人民之福,但舆论导向与舆论自由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二者之间辩证统一。这就要求我们超越政治权术,不断加强和改进舆论治理艺术。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阐述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10]这是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定位和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要求“党管媒体”切实做到想管、会管、敢管。也正是列宁曾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所包含的两个基本方面:“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想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

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会把工人变成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可怜奴仆。因此,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12]翻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对“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破坏。

3 总结与省思

如西方国家选举中的所谓扒粪现象,往往使一些政治人物被扒得体无完肤,严重损害民众对政治的信心:据法国巴黎政治学院2016年的政治分析报告反映,有89%的民众认为政治人物不代表民众,认为政治人物诚实的只有23%,认为他们腐败的则高达75%。对政治人物不信任、厌恶、烦感的高达78%。《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针对这次疫情即指出:“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不只因为冠状病毒本身,还因为人类之间缺乏信任。要战胜流行病,人们需要信任专家,公民需要信任公共当局,国家之间需要互相信任。”但是,其真正致命的缺陷是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资本优越,不能也无法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西方国家公共政治权力受制于私有资本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西方国家政府所掌握的抗疫物质资源较少,其更多地是掌握在私有资本手里,因而缺乏集中力量抗疫和有序有计划抗疫的强大组织能力。

资本总是唯利是图,这次抗疫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置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于不顾,一切经济(资本利益最大化)至上。疫情中美国政府不是首先全力以赴救人,却着重千方百计复工救市。据CNN报道,在越来越频繁的“重启”声中,美国各州采取了不同的节奏恢复经济。然而美国卫生专家称,没有一个州符合重启经济条件。如5月7日,美国爱荷华州一家肉类加工厂在关闭两周后复工。就在复工当日,当地县卫生官员宣布工厂1031名工人感染,占到员工总数的37%。再如,美国特斯拉电动车及能源公司总裁埃隆·马斯克指令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主厂复工,他表示自己将亲赴生产线,加入流水线旁职工们的行列。他还声明:“若要抓人,

那我恳请只逮我一个。”马斯克早就抨击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抗疫措施,现在更以行动发出挑战。马斯克之所以敢藐视法律、不惜牺牲工人的生命,他的底气就来自于资本:马斯克威胁称,将不惜将特斯拉总部所在地从加州迁往得克萨斯州或内华达州。面对资本的压力,加州州长纽瑟姆已表示,有可能于下周就允许重新开工。甚至美国密歇根州、马萨诸塞州、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均出现武装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放宽防疫限制,重新恢复经济。左翼学者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在“社会主义复兴”网站发文,指出这些极右翼抗议者得到了资产阶级的资助和支持,呼吁广大劳工必须组织起来对抗反动势力,努力捍卫自身利益。^[14]美国《时事》杂志主编内森·鲁滨逊更直接认为,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美国人应该希望自己的国家稍稍多一些社会主义。^[15]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国家公共权力优越,有党的坚强有力领导,和国有企事业组织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因而可以也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能够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先救人后救市,才是我们取得抗疫胜利的最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中国的抗疫物质资源更多地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因此其具有集中力量抗疫和有序有计划抗疫的强大组织能力。中国政府能够迅速组织动员全国公立医院的340多支医疗队、4.2万多名医务人员支援疫情重灾区湖北省、武汉市,能够高度有效地在全国调配抗疫所需的各种人、财、物,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短短十天时间就能够拔地而起。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地方政府的舆论治理对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公开透明型治理缺乏有效的价值认同与制度适应。

张维为先生即承认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中国每年出版的书籍当中,到前年为止大概20%是翻译图书,现在可能比例稍微低一点,但我估计可能仍有10%。但像美国这些西方国家,翻译出版的书籍不到1%。”^[16]笔者以为,我们应反躬自问,自己在文化知识积累创新上,有多少东西值得人家翻译介绍,中国文化出版领域目前充斥着的是遍地的低水平重复垃圾。

中国在疫情治理中,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而在抗疫中西方国家大都犯下严重失误:如法国的

前卫生部长、英国的《柳叶刀》主编、美国的情报机构都坦承,早在1月份就已向国家最高层提出警告,却没有任何人当回事,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漠视危机,不做任何准备,竟然连口罩都严重匮乏。并且,出现疫情后一些大型的活动照常举行:比如意大利的球赛、伦敦的马拉松、法国每天有70万人参加的农业展,甚至法国已经宣布进入第三阶段大爆发,却仍然号召数千万人出门投票,美国则一直声称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流感。

赞美固然有利,但批评也不无益处。古人即曰“忠言逆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倘若要寻求一种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或方式,并不是放任自身的好恶感去拒绝批评,而是在与各种批评展开自由的对话与交锋中,去寻求努力接近真理或真相。

如今年两会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讲到,我们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一数据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热闹地讨论。事实上总理讲的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之一,即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在生存线附近徘徊。无论是从检测能力或政策来讲,中国的数据都是最完整、最可靠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也最具参考价值。西方许多国家公布的数据则不包括疑似、轻症,更不包括无症状者,其准确性和中国比差得很远。然而,这个世界荒唐的是,中国还没有指责西方数据不准确,西方却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笔者认为要弘扬主旋律,倡导主流价值观,加强社会舆论治理的科学艺术性。这对于保持国家社会稳定很重要很必要。这次疫情的发生、发展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及官员或者重视不够、应对不力,或者举措失当,暴露出一些官员能力不足、作风虚浮。这些问题引发群众对地方官员能力和作风的质疑、批评,有些批评还十分尖锐。

现代科技很大程度动摇了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性和传播渠道的垄断性,因此国家治理中的舆论治理需要自信之成长与兼容之成熟。社交媒体的活跃不只意味着媒体业态的改变,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公共领域真正的公共化要求新的思维方式与管理方式,平等、客观与对话则是维持其公信力和有效性的关键词。此次抗疫,畅通言路,顺应民情时势以设策施政,为一切政令政策得以成功之根本途径。抗疫初期武汉地方之失序,其后中央施策之成功,都

表明了这一点。保持信息畅达既有利于快速反应,又有利于舆情引导。

中国的社会舆论治理正不断走向文明和成熟。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D]. 求是, 2020(4).
- [2] 休谟著. 张若衡译. 休谟政治论文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27.
- [3] 徐会平. 意涵与保护: 美国言论自由的考察与分析——从煽动性诽谤谈起[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 [4] 安东尼·赛奇. 要正确看待日益强大的中国——访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管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安东尼·赛奇教授[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1).
- [5] 曹林. 反新闻规律的“贪官新闻”[EB/OL]. 新浪网新闻专栏, <http://news.sina.com.cn/zl/zatan/blog/2014-07-09/10101829/1193210930/471ef4320102uwrdshtml>.
- [6] 宋鲁郑. 巴黎日记: 面对疫情, 西方进入无人区[EB/OL]. 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20_05_11_549921.shtml, 2020-05-11.
- [7] 韩少功. 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J]. 文化纵横, 2020

(2).

- [8]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139.
- [9]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880.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32.
- [11] 列宁. 列宁全集(第1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121-122.
- [12] 马克思恩格斯.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13] 赫拉利. 阻止全球灾难, 需要重获失去的信任[J]. 三联生活周刊, 2020(3).
- [14] 美国极右翼抗议者持枪要求经济“重新开放”[EB/OL]. 察网, 2020-05-16, <http://www.cwzg.cn/theory/202005/57649.html>.
- [15] 多一点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N]. 参考消息, 2020-05-26.
- [16] 张维为. 美国是最没有资格提香港问题的[EB/OL]. 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20_05_30_552308_2.shtml, 2020-05-30.

Dialectical Thinking on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in National Governance——Taking the Example of Global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YU Chongsheng, HE Lus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Hubei Province, Wuhan Hubei Province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formed a market-oriented objecti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a realistic view of the objectivity and rationalization of power. China, in contrast, has formed a planning subjecti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deification of subjective moralization of power. Therefore, the western countries are relatively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Comparatively, China appears to be subjective in this respect, which leads to the fact that western countries have higher public creditability than China. Western countries have strong fault-tolerant ability, loose error-correcting ability and flexible and bold innovation ability. On the contrary, due to its low public creditability, China has weak fault-tolerant ability, harsh error-correcting ability and rigid and conservative innovation ability.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ough China has performed well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epidemic, this paper recommends that China should keep a clear head and do not be blindly optimistic and too proud. In contrast, China should be aware of its exposed shortcomings, make conscious reflection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ke timely remedie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public creditability; the Covid-19 epidemic